

北京歷劫記（二）

近藤妙子作・陳鵬仁譯

紅場掀起文革風暴

從一九六五年年底到一九六六年年初，曾經有一種傳說，說是將要發起新的運動，這運動叫做「文化大革命」；規模非常大，誰能經得起這個運動的考驗，誰就能生存下去。但我們對其內容却一無所知，而祇感覺不安；我所服務醫院的黨員們，開始前可能也不知道。而令我最害怕的是「革命」這兩個字，因為以前的任何運動，都沒有這兩個字眼。

大部份的人都以為，既然說是文化，自當有關文學家、小說家、電影界等人士的事，與醫生、護士風馬牛不相及。但在醫院裏的人却覺得一定有些人非做晝死鬼不可，有「弱點」的人將被整得慘慘地（所謂弱點，乃指中國國民黨黨員，在三反五反、反對漏稅、偷聽國家重要情報的運動、被羣衆圍攻過的人，如地主、富農、資產家的出身者等等）。

整風運動（反右派鬥爭）的時候也是一樣。

有人因為忘記說些事而被批判，最後被當作右派而受到排擠。在階級鬥爭過程中，右派份子是敵

人，其一家人將被敵視和孤立。雖然同情他（她）們，但裝作不知道才不會引起彼此的麻煩；如果有人同情和幫忙他（她）們的話，這個同情者必將遭遇到相同的命運。被孤立的人，父子、母女不必說，很可能連累到其親戚，因此中國人對這「運動」非常敏感。

紅衛兵羣到處橫行

文化大革命的火種是一部小說。一九六五年十一月，曾經有人在上海「文匯報」上撰文抨擊說：歷史學家又是「北京市副市長」的吳晗所寫的「海瑞罷官」這個歷史劇，是諷刺毛澤東免職彭德懷的，而這個人就是日後成爲「四人幫」之一的姚文元。姚文元又於翌年批評吳晗、鄧拓、廖沫沙三個人合寫的「三家村札記」和鄧拓的一「燕山夜話」是反動作品；此項批評刊登於「人民日報」。從而一舉開始文化大革命。

大致來說，中央的運動都是由學生發起的。

一九六六年五月左右，最早的紅衛兵一出現，便立刻波及到全大陸的大學生、中學生和小學生。當三家村的事見報的時候，熟人中川由廣州

來北京，並拿着報紙問我「三家村札記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，我們答說不知道。

沒多久，北京大學的顧元梓（女性），在壁報上批評北大校長陸平，並獲得毛澤東的支持，而鬧得滿城風雨。我們的醫院，也有人去看那個壁報的，因此街上便也開始張貼壁報。它主要是說，北大還是以舊思想教學問，應該予以改正；校長受的是國民黨時代的舊教育，他這樣原封不動地教學生是錯誤的，教育必須改革。

寫在學校牆壁的，雖然有些是一文不值，但還是獲得人們的讚揚。

能够做紅衛兵的人一定是「成分好的人」（地主、富農、反革命、右派、出身資產家以外的人），即是農民和工人階級（沒有財產的勞工）。這些份子的小孩們，在胳膊上很神氣地帶着上面寫有紅衛兵的紅布條。中共中央委員會的文化革命小組曾經下命令說，對於任何紅衛兵的行動，不許由外部予以阻止，所以負責維持治安的公安工作人員和中共的軍隊（即所謂「解放軍」）都不能制止紅衛兵的行動；紅衛兵被擰上天了。



①右起：張炳煌，譯者陳鵬仁教授、辜振甫、林金生、方仁惠合影。



②作者近藤妙子與夫婿王和成之結婚照。

和尚尼姑不知所踪

紅衛兵說是要「移風易俗」，把破壞傳統文化當作文化革命，因而隨便毀滅具有古老風俗的場所。寺廟的佛像、基督教的十字架、古屋的門飾，連街名都變成了革命的名字；譬如在朝陽門的大寺，原有一對地獄和極樂的雕刻佛像，意味着死了如果到極樂將享福，如果到地獄將被割掉舌頭。而下十八層地獄的兩座像，中共來之前我看過的，但現在却被打碎，連寺院也沒有了。往昔在北京佛教很盛，有許多和尚尼姑，但佛像被破壞以後，他（她）們似乎都改了行。

寺院前面的哼哈二將、羅漢都不翼而飛；在我們宿舍門前的小狗也被打壞，並丟掉了。

北京從前的街名和店號也被改了，他們所取的新名稱都與革命有關，例如「向陽」、「反帝」、「紅太陽」、「延安」等等。

我所服務的醫院被改成白求恩醫院（取自加拿大的革命醫生白求恩的名字），協和醫院也被更名為反帝醫院，蘇聯醫院變成反蘇醫院等等。這樣一來，最受罪的是郵差，據說因為街名和固有名稱的變更，有許許多多的郵件無從投遞。

五個小鬼搜索我家

在中央中央第八屆十一全大會，毛澤東作了有關文化大革命的決定，我們每個職員都被分發了這個小冊子。我們讀它時，發現了一些很令人提心吊膽的字眼：「走資派」、「修正主義」、「叛徒」和「間諜」。毛澤東太太江青在這本小

冊子裏說，再小的地方也潛伏着間諜，機關、工廠、華僑之間也有，所以要特別留意去發現……

。

記得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八日前後的事情，我上午上班，中午休息回家吃完飯，一點半左右回到醫院的時候，總務主任李慎琪命令我說是

有事，要我再回宿舍去；我直覺出了問題而趕緊回家。回到家門口，看到門上貼着一張粉紅色的壁報，它說：「要打倒王和成資產階級的四個舊惡」。所謂四個舊惡是：「舊思想，舊習慣，舊文化，舊風俗；最後署名「紅衛兵」三個字。

我的先生王和成也回來了，下女和小女也在家。我覺察終於輪到我們了。

我先生說，他沒作過虧心事沒關係，並以出乎意料之外的表情笑着。此時來了跟我們住同一個宿舍的五個初中生——兩個是黨支部趙鳴的小孩，兩個是X光線室崔振起的小鬼，另外一個是國民黨員師文星的兒子。他們都沒帶紅衛兵臂章。我們覺得有疑問，因此打電話給醫院說，我們沒有被搜查的理由。院方答說：「現在公安局和軍隊都不能干預。」

後來我們纔知道，這是趙鳴令孩子們假裝紅衛兵所搞的勾當（趙鳴是共黨支部書記，以前是醫院的工友。在幾次運動表現「積極」，故爬上去了）。

這五個初中生叫我們到下女的房間去，然後開始搜查我和我女兒的房間；他們把窗紗拉緊後，便東翻西找，繼而用鎬挖地下。當然我們不在

乎，因為我們沒有任何不可告人的東西。

他們的目的是，以為我們是間諜，要調查我

們有沒有隱藏暗號機或手槍。從下午三點到凌晨三點，前後搜查了十二個小時，因此我們在下女的房間過夜。

次晨，我到醫院報告說，五個小孩搜查了我的家。現在想起來實在有點可笑，不過毫不知情的我，當時是非常認真的。

於是趙鳴（接到孩子們的報告，得知我家一切的他，在心裏可能正在竊笑着）要我休息一天，回去整理。

翻箱倒篋地無立錐

回家打開房門一看，真把我嚇一跳；他們把我房間翻得幾乎沒有立錐之地。我邊整理邊留意被拿走了什麼東西，結果發現我從日本帶來的變壓器不見了，孩子們大概以為這是間諜用的暗號機。塑膠箱子也沒有了，他們可能把變壓器裝在這個箱子帶走的。另外還有家父給我的五、六封信、日本的醫師執照、博士證書、相簿、日記簿、筆記簿等等，以及五個金戒指和五個一兩的金塊。三百六十元左右的現款，被撒在沙發椅後面。趙鳴的一夥，似乎以為我們幹間諜，一定藏有幾億元，所以纔挖地上。但我們的存款不多，除薪水以外又沒有什麼現款，因此使他好像有點失望的樣子。翌日，他們祇把變壓器還給我們。

我們以為祇有我們倒了霉，但後來據說，因爲趙鳴在醫院的檔案作了詳細調查的結果，地主出身者、資產家、反革命出身者的家都被醫院的

紅衛兵搜查了。我們醫院的醫師和護士，在大陸變色前，許多是資產家和地主的兒女。

所謂檔案，可以說是一個人的履歷書，而最重要的是出身的階級，它分成地主、資產家、反帝、右派、農民和工人，從雙親到祖父，寫得詳細細；此外還寫着政治面目（共產黨還是國民黨），其本人的家庭和亲戚在政治上有沒有問題、工作能力、賞罰和海外的交友關係等等；主管人事的趙鳴更要求加上意見。

那時候，天天真是可怕，林彪和四人幫橫行於世，大學生一個接一個地搜查着高級幹部；在體育館舉行鬭爭「北京市長」彭真和鄧小平的聚會，更發出「要打倒資產階級之司令部」的指示，其目的是要打倒劉少奇派。

現在，我回想起文革當初，商社人給我的日本報紙說：「此次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毛澤東要打倒劉少奇。」當時我並不相信；因為毛澤東和劉少奇是從抗日戰爭，為中國並肩作戰的人，不可能彼此相害，所以我把這份報紙燒掉了。但從今日來看，日本記者確有其眼光。

反抗的人多遭打死

文革的暴風雨非常兇猛。有人說，跟我們住同一條街的地主出身者，昨天晚上被紅衛兵拖出去，用皮帶綁着頭而被打死。以前的國民政府軍中將的黃某，大陸淪陷後坐牢六年，出獄後在某醫院工作，因與該醫院的護士戀愛結婚成家，自己作漢醫。紅衛兵去找黃家「算帳」，黃太太說：

你們的作法不對，黃先生已經服完了刑，應該沒

有事；但他們還是要把黃某帶走，於是黃太太好像拿了菜刀抵抗，因此紅衛兵暴怒，而用皮帶把她打死。據說，因為打得太厲害，她的眼珠都跳出來了。

我們醫院急診室前面地上，倒着好多個半死半活的人，被打破頭的、臉部受傷的，個個都呻吟着，奄奄一息。我們得跳過這些人纔能够到我們的辦公室。醫生也被禁止為他們治療，禁止人是醫院的紅衛兵。被送來的多是地主出身的資產家，這些地主過去是不是真的欺侮過農民，他們根本就沒調查，祇因為是地主而被殺；半死的人，都被抬到太平間去了。

中午，我回家吃飯途中走過西單時，看到一部大卡車載着血淋淋的死人和半死人，而且連蓋也沒蓋，往八寶山的火葬場開去。我心裏在想，中國人殺中國人，而且由四人幫無動於衷地作這種指示，我真是想不通。

這時候，紅衛兵說不可以使用外國的東西，於是我和P氏便以油漆把寫在腳踏車上的「山口自轉車」字樣塗掉；同時禁止燙頭髮，如果有人燙，將由紅衛兵剪掉，所以我遂把頭髮剪得短短的。

串連鬥爭慘不忍覩

紅衛兵從全國各地，有如螞蟻般地往北京蜂擁而去；與此同時，北京的一部份紅衛兵也往其他地方移動。這種紅衛兵、高初中學生，隨便到處免費旅行叫做串連；毛澤東支持他們，所以旅費、吃飯、住宿都不要錢。

在日本也會流行一時的「造反有理」這個口號，文革初期用得很多，但後來，紅衛兵太胡鬧，因此有人主張「反運動派的造反也有理」，以為緩和。

因為陸續來到北京的紅衛兵把北京搞得滿城

我們的醫院也準備了三個大房間，以便「接待」紅衛兵，把病人用的棉被搬出來，並預備飯菜。每天一批又一批地來，把我們忙壞了。這樣還是收容不了，因此我們祇有騰出我們的宿舍。我們拿出了客人用的棉被，飯菜由街內的婦女來做，當然都是「公差」。

住在北京的中學生、大學生都隨時隨地要到「外地」去（譬如上海、廣州、廈門、延吉、大連等地）；免費坐火車，太方便了。我女兒也曾經乘機與朋友旅行了青島、大連、上海和廣州。她們到處都以「毛澤東的紅衛兵」受到「歡迎」，供飯吃，但我却很駭心，因此在我女兒上衣口袋塞了錢。我相信，那時候大、中學生的旅行，可能比日本的畢業旅行還要輕鬆而愉快。

迨至八月間，從各地來到北京的紅衛兵——以「毛澤東的紅衛兵」身份，前後八次，曾經在天安門廣場集會，毛澤東穿着中共軍軍服，帶着紅臂章歡迎他們。毛澤東說：打倒剝削和壓迫人、農民、革命的知識份子、革命黨派的一切地主階級、資產階級、帝國主義及其一夥，使這個運動的造反有理。在文化大革命運動期間，他是支持紅衛兵與紅衛兵採取同一態度的人。

造反有理滿城風雨

（一）記劫屋京北

風雨，而且在各地發生武鬥，被紅衛兵打的孩子們，另外搞組織予以對抗，因而彼此衝突。中央文化革命小組覺得亂得太不像話，要紅衛兵各自回到自己學校，以平靜其混亂；但紅衛兵却不肯聽話。

當時，中央文化革命小組的實權，操在康生、陳伯達、江青和林彪手裏。及至一九六七年，姚文元、張春橋和王洪文由上海崛起。

每年要舉行的「勞工節」（五月一日）、「國慶節」（十月一日）等共產黨集會，通常「國家主席」等最高幹部都要在天安門紅樓露面，而由其排列順序，可以判斷他們在那一年的地位。但自毛澤東在壁報上發表「砲打司令部」（打倒資產階級的司令部，它意味着打倒劉少奇）以後，劉少奇就沒有站在毛澤東旁邊，其排名且逐漸下降，而由林彪取代第二號人物的地位。

劉少奇老婆被拖走

有一天，在我們醫院發生了「事件」，這是晚秋時候的事情，醫院的情形有點不大一樣。一間，說是好像發生了什麼大事件，紅衛兵心不在焉，而且醫院的電話線都拿掉，不許我們使用。

紅衛兵所搞的詭計是，要把劉少奇的太太王光美騙出來，並帶到清華大學去鬭爭；為此，他們設計了一個圈套，即劉少奇的第二個孩子劉平，因爲車禍被送到醫院。劉平平是師大附小的學生，他姐姐劉亭亭是師大附中的學生。他們用電話把亭亭叫到醫院來，並帶到小小的五病房，要她打電話給媽媽說：「弟弟因爲車禍腿斷，被送

到第二醫院來，目前正在X光線室照X光，請趕緊來。」

起初劉亭亭不肯幹，後來被紅衛兵圍起來推推搡搡，纔不得不打電話。過一會兒王光美從醫院的後門進來了，這時紅衛兵和在那裏待機的清華大學學生便抓住她，並用卡車把她帶走。

爾後，劉少奇穿着軍用大衣和長筒鞋子來了。我跟他距離不到一公尺，但我不敢對他說車禍是虛構，他太太被紅衛兵帶到清華大學去了。劉少奇大概覺得情形不對，遂坐大型的黑色轎車回去。而當他帶着軍隊趕到西單時，一切都結束了。

我在我的面前看到「劉主席」，而且這是最後的一次。從此以後，劉少奇便遭遇到悲慘的命運。

我在我的面前看到「劉主席」，而且這是最後的一次。從此以後，劉少奇便遭遇到悲慘的命運。

醫院院長腿被打斷

醫院裏很流行「奪權鬭爭」。奪權就是奪取對方權力的意思，對權力者可以成立造反組織，以奪取其權力。我們的醫院，一時有過三十個以上的造反組織，由談得來者各立造反組織，這些組織後來統一，成爲造反派。造反派的黨員，大多不引人注目，不善辭令，比較老實，他們得不到院長的照顧，所以心裏很不滿。

另外還有所謂保皇派（權力派），這是指以黨支部爲中心而成羣的黨員，或是青年團積極份子的一羣而言；他們多有「兩手」，所以權力也就在他們身上。

是因爲造反派的奪權所致。我們的醫院也是一樣，造反派發洩了平時的積憤，而顯得滿面春風。奪權鬭爭在軍隊、工廠、學校、社會到處發生，有的甚至於發展成武鬥；但被奪權者又要拼命把它奪回來，於是奪權鬭爭便陷社會於更混亂的局面。

我們的醫院也曾經發生過這種情況。此醫院

有兩個院長，一個負責政治（務），一個主持醫務。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被批鬥的院長，隨時更換，因此有個時期，兩個院長都是女性。醫務的石院長是在共軍軍隊裏稍微作過護士的人，丈夫到北京後，因肝臟病死亡，現在單身跟我們住同一個宿舍。月薪一百六十元左右，早就買有蘇聯製電視機，愛乾淨。負責政務的院長姓朱，職員們對她的風評並不好。有一次，醫院裏貼了一張「砲轟潛在黨內之資產階級的司令部」的壁報，黨員們便張開眼瞪着石院長。她有蘇聯製電視機、資產階級的嗜好……，是資產階級的實權派，於是石院長遂成爲被鬥爭的對象。這場鬥爭非常厲害，她被拖到臺上，平身低頭讓大家用棒子抽打；她的腿被打斷，又不許她住院，無奈以丁字拐杖來往治療，最後更不准她回家，而在一個房間與死人同起居。

石院長受到攻擊以後，跟她要好的醫生和護士便成爲批鬥的目標。並在壁報上寫出他（她）們的弱點。事件的原因來自醫院裏意見的衝突，而武鬥使局面更加混亂。

如此這般，愈來愈亂，普通醫生「奪主任的權」，陷醫院於無政府狀態；護士作醫生的事，

工友替病人看病，這已經不是醫院了。因此患者日趨減少，而祇剩下無所謂的病人。由於一天到晚誰都不負責任，而一天到晚專作武闘，所以「聰明」的人便假裝有病在家裏玩，照領薪水；對此，既沒人問也沒人管，大家都裝傻。

背讀毛語錄老三篇

在文化大革命期間，毛澤東是「神」，被讚美為「太陽」。任何人的房間都得掛毛像，誰不掛誰就是「反革命」，因此連洗臉間和廁所都掛毛像。如果用刊登毛澤東像片的報紙擤鼻涕或者引火，隨時隨地會被戴上「反革命」的帽子，受到人們的批評，這個人的一生將嗚呼哀哉。

我們醫院的所有房間都掛着毛澤東像。早晨上班，舉行早會時，一定要高舉「毛澤東語錄」，大聲喊叫「毛主席萬歲，萬歲，萬萬歲！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林副主席身體健康，健康！」

而且，每天要背毛澤東著作的文章「老三篇」

一。所謂「老三篇」是一為人民服務；二紀念白求恩大夫；三愚公移山。我終能背誦其中的文章。它的意思大致如下：

一、為人民服務：中國人民是人民的服務員。為人民利益，必須奉獻生命；祇要有生命，在醫院要努力於減輕患者的痛苦和恢復其健康。為國家要犧牲自己。

二、紀念白求恩大夫：要紀念由加拿大來的醫生——加拿大共產黨員諾曼·白求恩。他在中國人的軍隊（中共軍）裡，不眠不休，從事治療，終於被病人傳染病菌而身死。

三、愚公移山：他從中國古書上的愚公老人，為除去阻礙他家南面的一座大山，動員他的子孫，搬土填海的故事，把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比作兩座大山，說明中國人民從其本身、兒子、孫子，參加戰鬪的，祇要能够團結，便能戰勝任何困難。

電影和戲劇也完全變了。我喜歡談戀愛的、

在有錢人家吃飯、喝酒、跳舞的電影，尤其是從香港來的；但這些都被批評為資產階級的東西，而變成「反革命」的。它們特別強調階級鬥爭，譬如地主之剝削農民，姑娘將被強暴時被共軍「解救」等等。同時上演「白毛女」的芭蕾舞和話劇。醫院給我們電影票去看，惟因下次學習時得作評語，所以不好看的電影也得「認真」去看。歌也幾乎都是「革命歌」，多半是用「毛澤東語錄」的文章加上曲子而成的。

我先生王和成被捕

文化大革命剛開始的時候，以工作隊的名義

，十來人進入我們醫院裏，要平息紅衛兵的亂鬧，但沒多久就離開了。後來據說這是劉少奇派的工作隊，是派到各機關、學校的。

這個工作隊一同去，便來了十來個共軍士兵，這是毛澤東派的。據說其目的是擾亂平靜以後，要抓躲藏着的真正敵人。但不管從那一方面來說的，我都不知其底細，而祇是提心吊膽；惟因我家被搜查過，所以從其氣氛，我知道我們已經成爲某種目標。

我先生王和成也是一樣。造反派的人雖然保

護了王和成，但他們的力量太有限了。據說，在各部門工作，留學外國的華僑都陸續被捕了；因此留學日本和美國而地位高者，很顯然地都是共產黨要整肅的對象。

起初很沉着的王和成，隨醫院的日益混亂，便因心勞而開始冒痛，並終於以胃潰瘍而不得不住進宣武醫院。這是一九六七年的事情。所以，一下班回家，我就做比較有營養的菜，連同牛奶送給我先生。

我們的醫院，大概不能老等王和成的病癒。

內情似乎是，院方令以前跟我們很要好的總務主任李慎琪到宣武醫院說，王和成出院以後就會被逮捕，因此不必給他牛奶和好菜。從翌日起，宣武醫院對王和成的態度完全改變，也不給牛奶了。但王和成的病多少好了些，並於兩個月以後的十月三十一日出院了。出院當天，住在其他宿舍的外科醫生和好朋友都到我們家裏來，這是我們一家人團聚的最後一天。

呼救無門 我也有罪

王和成於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一日，從我們面前永遠消失了踪影。他出院的前一天，身體好像只好了一點點而已，我們希望他出院以後能够在

家裏養病一陣子；那一天我照樣上班去。

下午三點鐘左右，王和成接到醫院來電話說，擬商量有關病人之事，要他到醫院去一下。由於打電話的是李慎琪，所以他毫無遲疑地就去。這是他被拘留的第一天。那時我在圖書館，完全不知道這回事。王和成支持造反派，拘留他的是

保皇派。打電話要王和成去的李慎琪是他最相信的人。多年來，我們兩家過從最密；李慎琪找不到工作時，王和成雇他為醫院的工友（服務員）。他出身工人階級，腦筋好，努力於工作，因此得以加入共產黨，從而爬上總務主任的位子。由於這種原因，王和成一直把他當作自己人。

得知王和成被拘留的我，傷心極了。醫院的牆壁同時貼出了壁報，上面寫着一九四六年發生的「沈崇事件」（說是美國兵強姦了北大學生沈崇，要當時的警察醫院院長王和成診斷，王和成起初要他們找婦產科醫生，但他們不肯。王和成問當事人美國兵怎麼回事，美國兵說他付了沈崇四美元。王和成檢查了沈崇的洋裝，看看有沒有美國兵的精液，結果沒有，亦即沒有證據。這個文件遂移送法院審判，王和成是第一個證言人，

他覺得沈崇是不是真的被強姦，頗有疑問，因此答說「不知道」。於是受到大學生的譴責。後來據說這是毛澤東所導演的事件），所以我知道它含有間諜嫌疑的意義。我束手無策。文化大革命的時候，既無法律，誰也無從幫忙。他們可以為所欲為。王和成是「罪人」，我是「罪人」的太太，因而受到大家的注目。我和我女兒，不知道應該如何是好。我更擔心昨天剛出院的先生的健康，我們好幾天睡不着覺。

我不知道我先生王和成被關在那一個房間，去請教某位醫生，他偷偷地告訴了我。王和成被扣留在保皇派的「大本營」院長室，那是榻榻米四張半左右大的小房間，朝南，太陽光可以全部照進來，所以冬天還好。但我却完全不知道我先

生在那裏作什麼，受着什麼規勸。我猜想有的壁報雖然以「沈崇事件」而說王和成是國民黨特務，但他們的真正目的是，由於他跟日本商社人員來往，因此希望把他裝成日本特務；為此，他們扣押王和成，調查他跟誰見面，談了些什麼話，以這些為材料，早日押送警察機關。

要我交出寶貴物品

先生既然被扣押，我自己當然也不安全，但我更加憂慮他的身體。他的胃潰瘍並沒有痊癒，他吃的可能是給狗吃的那種飯。為了給他加營養，我送去他最喜歡吃的烤魚，但他們是不是轉交給他吃了，我也不知道。我也送去了洗好的衣服，而從人們的談吐，王和成好像沒有生病。

白天我在醫院認真地工作，晚上，我自己也可能被扣留。為了能够儘量減輕我先生的罪而開始整理房屋。我處理了二次大戰期間，我們從日本帶來要用於手術的器械，和兩罐包在紗布的注射藥。貴重金屬和重要文書早已被扣押，屋子裏祇有我回國省親帶回來的電氣用品和衣服。

有一天，造反派的青年王作義悄悄而親切地問我：「你家裏有沒有寶貴的東西？如果有，交給我替你們保管。」王作義是化驗室的職員，二十五歲左右，平常很老實，在化驗室很少人理他，我們好幾天睡不着覺。

據說，他是共產主義青年團團員，乃父和妹妹都是共產黨黨員。此時我最盼望人家的親切，因此遂把在國民黨時代買的一百四十枚洋錢銀幣，裝在一個小箱子交給他保管。

此外我還有存款簿，如果不寄託別人，被銀行凍結的話，將領不到；而我如被扣留，則可能會被沒收。如果我轉移財產或者拿走存款簿給「當局」知道的話，就算犯了罪；託人家保管時，受託者很可能同罪。我以為，託日本人（外國人），他們也許會客氣一點，所以我便把它交給一位日本太太保管。聽說，隔壁的醫院，某位太太也被警察扣押；跟我們很親近的T的先生也被醫院扣留，因此我更感覺到我自己身上。這時有人告訴我，給周恩來「總理」寫信，他或許會幫我調查，於是我就往「國務院」寫信。我連續寫了兩封信，但都沒答覆。也許被沒收了。

T的先生也被扣留，所以她跟我說，如果到中央軍的戚本禹那裏去，他或許會「很親切地」替我們查，因此我倆去了；但後來一想，他們到醫院來調查，一定去找黨支部的趙鳴，結果還是不利；因而我在中途就放棄這個念頭。

給我一個黑色紙團

某日，我送飯去給我先生，經過保皇派事務所回來的路上，突然有個東西丟到我身邊來，我嚇了一跳，看地上却有一個黑色紙團；我趕緊檢起來，並拿回家打開一看，竟是大約十公分方形的報紙，裏頭這樣寫着：

- 一、我很好，此事要跟叔叔商量。
- 二、女兒學校畢業以後，叫她在工廠工作。
- 三、所謂叔叔，是王和成父親的妹婿，現任「陝西省主席」。看了此信以後，我愁於怎樣回信。

(一) 記劫歷京北

沒有這種機會。經過大約一個星期，我到事務所時，又來了紙粒。我很替他擔心他這樣作。回家以後看它，上面說：跟對方講好，說那個收音機是我們送給他們的。一九五七年，我回國省親時，買了一套有電唱機的收音機。一九六一年，我再次回國省親時，另買了立體音響收音機，所以把以前的收音機賣給人家。他的信是對此事的交代。

第三次是女佣人的姪女送飯去之時。我會吩咐她要特別留意把信帶回來，但她檢的時候可能被看見了，此事後來連累到王和成，不過當時什麼也沒發生，因之我得以讀他寫的紙片。但其內容却非常嚇人。

「趙鳴來說，要把我送到公安局。萬一我被送到公安局，妳應該即時跟我離婚回日本。我沒做過壞事，為什麼會遭遇到這種命運，想到這裏，我不禁流淚。」

讀完此文，委實使我不知道應當怎麼辦。於是我跟造反派的人商量，那個人叫我寫信，並說要替我送去。爲了使他放心，我這樣寫着：

一、被扣押的不止你一個人，T氏也是一樣。
二、兒童醫院黃先生的太太也被送往公安局。
三、你被送到公安局以後，你的健康恐怕保不住。但我會照顧小孩，請你放心。四、萬一你先走一步，請你留半個蓮花位子等着我。我先生看了以後作何感想，雖不得而知，但這却是我給他的最後一封信。

參加學習改造思想

帳戶，立即寄書

王和成投遞信被看到，成爲他日後被押送到公安局的一個開端；而在當時，則爲他們用木板釘死王和成住的房間窗子的藉口，這樣一來，太陽光就照不進去了，真是糟糕。

與此同時，我每天早上一上班的半個小時，晚上下班以後的兩個小時，得參加政治學習。他們說，必須改造我們的世界觀，而要改造思想，應該由外在的原因透過內在的原因以起作用……對這種說法，我是馬耳東風。

什麼學習不學習，我最關心的是我先生的健

康和我女兒的前途。我絞盡腦汁想營救我先生，但我的朋友都是留學生，大多被監視着。如此這般，在醫院裏我雖然常常是孤獨，但有人相信我先生不是壞人。

單獨見面時，這種人便會說，王主任很是可憐，但好像沒生病的樣子；以前在我先生的外科作過事的護士鼓勵我說，不能洩氣。因此，我像若無其事地天天到圖書館去上班，滿不在乎地走過我先生被扣留的屋子窗下。

(未完待續)

聖文 民國人物新傳

費雲文著 定價叁佰元

本書係費雲文先生繼戴笠新傳之後又一精心傑作，要目有：

吳佩孚新傳、陳獨秀新傳、汪精衛的悲劇、革命奇人張靜江、關麟徵的傳奇、國士典型陳布雷、陳大慶明達謙謹、當代名將邱清泉、模範軍人胡宗南、湯恩伯的一生、細說張國燾等篇，內容精彩，篇篇可讀。二十五開本，老五宋字，全書共伍百餘頁，珍貴圖照多幅，定價新臺幣叁佰元，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，祇收二百四十元。請將書款交郵政劃撥○七三九三三三一二號聖文書局